

# 集体化时期的农户收入:生命周期的影响<sup>\*</sup>

——以河北省北街2队为例

黄英伟 陈永伟 李 军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100836;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 100083;中国农业大学经管院 100083)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生命周期理论解释了集体化时期农户收入分化问题。通过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北街2队原始账本资料研究发现,家庭收入一定程度上受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中人口生命周期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家庭处在劳动供养比值较低的成熟期或处在人口劳动力较强的劳动旺盛期时,家庭收入较高;相反当家庭处在劳动供养比值较高的成长期或处在人口劳动能力较差时期时,家庭收入较低。总之,处在不同生命周期中的人口分化是家庭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家庭生命周期 农户收入 集体化 工分

## 一、引言

集体化是学界研究热点,也是事关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目前关于集体化时期农户行为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sup>①</sup>,但也存在不足,其中对农户收入的研究尤其缺乏。中国农村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实施集体化的目的之一,是削弱直至消除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分化,逐步使人民群众实现政治平等和收入平均,以达到人人均等的“大同世界”。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集体化创立者所设想的那样,仅农村社会而言,收入不平等现象并没有被消除。已有的研究表明,到集体化末期,农村中占人口10%的最富裕户却拥有28%的总收入,相反最贫困的40%农户仅能拥有总收入的16%<sup>②</sup>。就生产队而言不平等现象也存在,生产队中最富裕的1/4农户与最贫穷的1/4农户相比,其收入差距有2—3倍之多<sup>③</sup>。

这种现实与理想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学界已有一些讨论。如Chinn早在1978年就提出生产队的物质基础条件决定了农户收入差距<sup>④</sup>。此后更多的研究则从家庭人口结构出发,认为家庭中消费

---

<sup>\*</sup> 此研究受李怀印先生的启发较大,对李先生的帮助表示感谢。本文曾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双周学术交流午餐会(2011.11)和2012年留美经济学会年会(2012.6)上讨论过,感谢与会学者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十批面上资助项目的资助(资助编号:2011M500472)。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批准号:71103212)。感谢两名匿名评审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同时感谢时任生产队会计的杜彦亭及其女儿杜慧宁同志提供的资料。文责自负。

① 如Li, H. Y.: Family Life Cycle and Peasant Income in Socialist China: Evidence from Qin Village,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Vol. 30 No. 1, January, pp. 121—138, 2005. 张江华:《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集体行动的效率》,《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张江华:《工分制下农户的经济行为——对恰亚若夫假说的验证与补充》,《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6期;黄英伟:《工分制下的农户劳动》,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版;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2页;李怀印:《乡村中国记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186页等。

② Selden, 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Socialism*.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8.

③ Hsiung, B. Y.; and Putterman, L.: Pre-and Post-Reform Income Distribution in a Chinese Commune: The Case of Dahe Township in Hebei Provinc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No. 13, pp. 406—445, 1989. Selden, 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Socialism*.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8.

④ Dennis, L. C.: Income Distribution in a Chinese Commun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No. 2, pp. 246—265, 1978.

者与劳动者人口比率关系是决定家庭收入的重要因素<sup>①</sup>。一般而言,集体化时期,劳动力多、消费人口少的家庭,人均收入要高于劳动力少而消费人口多的家庭。而家庭劳动人口与消费人口的比率关系又与家庭生命周期紧密相联,这一理论最早由苏联经济学家恰亚诺夫在 20 世纪 20 年代提出,他认为农村家庭的贫富分化是由“人口分化”造成的。

在运用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探讨中国农村集体化时期收入差异问题上,Li<sup>②</sup> 做了一些尝试。他以家庭中妻子的年龄<sup>③</sup>为划分依据,利用秦村数据研究发现农户收入与家庭生命周期有较强相关性。Li 的研究较有说服力,并启发了本文的进一步思考。本文将在考虑家庭生命周期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人口生命周期对收入的影响。并利用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北街 2 队 1976 年)生产队账本数据进行检验。结论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中人口生命周期对农户收入具有直接影响,同时本土文化和制度因素也起一定作用。这一研究不仅对了解集体化时期的历史事件有所帮助,同时还对理解今天的“三农”问题提供借鉴作用。

接下的第二部分将介绍相关理论和已有研究,第三部分重点讨论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收入关系,案例地区的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也在这里提及,第四部分讨论家庭中人口生命周期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理论和文献综述

家庭生命周期(Family Life Cycle)是反映一个家庭从形成到解体呈循环运动过程的范畴。对于微观角度讲,家庭生命周期即为家庭从产生、发展、衰败到解体的过程,是每个家庭都必须经历的。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学者 P. C. Glick 于 1947 年提出<sup>④</sup>。他选出家庭中 7 个重要事件,分别为初婚、第一个子女出生、最后一个子女出生、第一个子女离家、最后一个子女离家、夫妻之一死亡、另一位夫/妻死亡,然后用这 7 个事件将家庭生命历程分为 6 个阶段,即 6 个生命周期,分别为形成、扩展、稳定、收缩、空巢和解体时期,如表 1。

表 1 Glick 家庭生命周期基本模型

家庭生命周期阶段	家庭事件	
	起点	终点
形成期	结婚	第一个子女出生
扩展期	第一个子女出生	最后一个子女出生
稳定期	最后一个子女出生	第一个子女离家
收缩期	第一个子女离家	最后一个子女离家
空巢期	最后一个子女离家	夫妻之一死亡
解体期	夫妻之一死亡	鳏寡者死亡

家庭生命周期和农户行为关系的理论研究,最早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经济学家恰亚诺夫。恰氏认为在自给自足条件下的小农经济,其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是相关联的,其家庭经济投入量是

① Nolan, P.; and Gordon W. : Socialist Development and Rural Inequality: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in the 1970s,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7, No. 1, pp. 3—48, 1979. Nolan, P.; and Gordon W. : *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13, No. 3, pp. 2—18, 1981.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10—213 页。Li, H. Y. : Family Life Cycle and Peasant Income in Socialist China: Evidence from Qin Village,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Vol. 30 No. 1, January, pp. 121—138, 2005.

② Li, H. Y. : Family Life Cycle and Peasant Income in Socialist China: Evidence from Qin Village,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Vol. 30 No. 1, January, pp. 121—138, 2005.

③ 1974 年的妻龄划分标准分别为:22—31 岁、32—37 岁、38—53 岁和 54—75 岁。

④ Glick, Paul C. : The Family Cyc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2. pp. 164—174, 1947.

由生产者主观感受的“劳动辛苦程度”和满足家庭需要的“消费满足感”两者之间的均衡决定的。家庭中劳动者人数代表劳动供给、家庭中总人口数代表消费需求,因此家庭中劳动人口与消费人口比率决定了家庭经济活动量(称为“劳动——消费均衡论”)。并且实证发现劳动——消费比率与家庭生命周期有直接关系(被称为“家庭生命周期决定论”)。

目前关于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行为关系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 (一)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储蓄行为

Modigliani<sup>①</sup>认为农户家庭储蓄与家庭生命周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其储蓄额在工作期间是正的,在退休后变成负的。但谢勇和董志勇等<sup>②</sup>用中国的案例发现农户储蓄与家庭周期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

#### (二)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消费行为

农户消费行为是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应用最广的领域之一<sup>③</sup>。高梦滔、姚洋认为家庭生命周期决定着家庭健康投资,处于生育期和抚育期的女性往往在健康投资上获得优先地位。<sup>④</sup>高梦滔、毕岚岚发现家庭规模与消费增长率负相关。<sup>⑤</sup>秦建群等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对信贷有较大影响<sup>⑥</sup>。

#### (三)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生产经营行为

关于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生产经营行为是近几年较为关注的领域。林玉妹、林善浪、王健认为相对于没有子女的年轻夫妇家庭,成长的核心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扩大的家庭的外出务工概率都较低、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的概率较高,有未成年子女和老人的家庭,需要转入土地。<sup>⑦</sup>家庭生命周期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sup>⑧</sup>。越老化家庭其农业生产性投入的意愿越强。<sup>⑨</sup>成长期的家庭土地规模经营意愿最强<sup>⑩</sup>。农户经济状况和家庭决策模式与家庭生命周期高度相关。<sup>⑪</sup>关于土地利用模式的研究有 Barbieri、Perz<sup>⑫</sup>等。

#### (四)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收入

关于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收入的研究成果较少,是尚需开发的领域。如家庭生命周期影响农村改革时期的农户经济。<sup>⑬</sup>农场规模与农民家庭规模是互为因果的,较多的土地使用能给农民带来更

① Modigliani, F. Life Cycle, Individual Thrift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6, No. 3, pp. 297—313, 1986.

② 谢勇:《中国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基于 CGSS2006 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董志勇等:《家庭结构、生产活动与农户储蓄行为》,《经济科学》2011 年第 6 期。

③ 这一方面的研究综述见刘艳彬《中国家庭生命周期模型的构建及与产品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关于家庭生命周期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参见潘彬、徐选华《资金流动性与居民消费的实证研究——经济繁荣的不对称性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4 期。

④ 高梦滔、姚洋:《性别、生命周期与家庭内部健康投资——中国农户就诊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04 年第 7 期。

⑤ 高梦滔、毕岚岚:《家庭人口学特征与农户消费增长——基于八省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0 年第 6 期。

⑥ 秦建群等:《中国农户信贷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Logistic 模型的实证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11 年第 5 期。

⑦ 林玉妹等:《家庭生命周期、土地流转与农业结构调整》,《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

⑧ 林善浪、王健:《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0 年第 1 期。

⑨ 吴洋等:《家庭生命周期、土地细碎化与农户农业生产性投入》,《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 期。

⑩ 林善浪等:《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土地规模经营的影响分析》,《财贸研究》2011 年第 4 期。

⑪ 史清华、侯瑞明:《农户家庭生命周期及其经济运行研究》,《农业现代化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⑫ Barbieri, A. F. Household life cycles,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land use in the Amazon: some comment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http://www. Population environment research. org/ seminars. jsp](http://www.Population environment research. org/ seminars. jsp). 2006; Walker R, Perz S, Caldas, et al.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in forest frontiers: the role of household life cycles.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5(2). pp. 169—199, 2002.

⑬ Feinian Chen and Kim Korinek. Family life course transitions and rural household economy during china's market reform. *Demography*, Volume 47-Number 4, November. pp. 963—987, 2010.

高的收入<sup>①</sup>。家庭生命周期是农村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sup>②</sup>其中 Li 专门研究了集体化时期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收入的关系。生命周期影响农户收入,是农村部分农户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sup>③</sup>

总之,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行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此本文将应用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研究集体化时期的农户收入问题。我们借鉴 Glick 的研究思路,并考虑中国农村的实际,将集体化时期的农村家庭按第一个子女的年龄分为四个生命周期,即起始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老化期。同时我们将家庭生命周期扩展到人口生命周期<sup>④</sup>,即人口从出生到结婚到生子到衰老再到死亡也会经历生命周期,因此我们按年龄和性别将男性人口分为五个生命周期、将女性分为六个生命周期(女性比男性多一个生育期,见下文),从而考察生命周期与家庭收入的关系。这两方面的考察将更加深入的了解集体化时期农户收入和农民行为逻辑。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活中的婚姻形式和家庭模式都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如未婚先育、单身家庭、领养等。因此家庭周期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和指责,虽然如此,但总体来看,研究与家庭相关的问题时该理论依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sup>⑤</sup>。对于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村来说,家庭周期理论具有极好的应用价值。因为这一时期家庭结构较为稳定和传统,家庭婚姻形式较为简单稳定,很少有未婚先育或离婚等现象,计划生育制度还没实施或刚刚实施,并没有影响人口的自然生长,户籍制度的限制使这一时期的人口具有很小的流动性。因此基于家庭人口变化来理解集体化时期的收入差异较为有效。

### 三、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收入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河北省北街 2 队(1976 年),该队位于华北地区的“核心地带”,属粮食主产区。以种植小麦、棉花为主,一年两季种植。1976 年北街 2 队有 93 户,384 人,有全劳动力 198 个;总收入为 78 175 元,全年总支出为 31 296 元,其中农业支出 25 708 元,占 82.1%,全年总分配金额为 46 879 元。

该地区集体化时期的分配制度是:粮食先按人口再按劳动工分分配,两者比例大概为 7:3,当粮食分配完以后再根据工分数量分配现金<sup>⑥</sup>,只有工分数超过所分粮食所需工分数时才有现金分配。该地区以传统的小家庭为主,户均 4.1 人,三代同堂的现象较为普遍。一般子女结婚后一两年或两三年内会分家单过,但老年夫妇会和最小的儿子住在一起(如果只有一个儿子一般则不分家)。和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女子结婚后会和丈夫住在婆家,结婚前则会和娘家的父母住在一起,并且会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女性的结婚年龄大概为 22.3 岁<sup>⑦</sup>。

#### (一)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划分

基于家庭中子女在整个生命中的大事件和子女数量将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家庭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起始期(阶段 1)、成长期(阶段 2)、成熟期(阶段 3)和老化期(阶段 4),见表 2。

① Clay D, N. E. Johnson. Size of the farm or size of the family: Which comes first. *Population Studies*, (46). pp. 491—505, 1992.

② Barbieri A. F., R. E. Bilsborrow & W. K. Pan. Farm household lifecycles and land use in the Ecuadorian Amazon.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27 (1), pp. 1—27, 2005; Iceland, John: Why Poverty Remains High: The Role of Income Growth,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1949—1999*, Demography, 2003; Li, H. Y.: Family Life Cycle and Peasant Income in Socialist China: Evidence from Qin Village,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Vol. 30 No. 1, January, pp. 121—138, 2005.

③ 徐月宾等:《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反思:从社会救助向社会保护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3 期。

④ 这一研究可参见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1 期。

⑤ Kapinus, C. A. ; and Michael, P. J. : The Utility of Family Life Cycle a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Tool: Commitment and Family Life-Cycle Stag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Vol. 24, No. 2, pp. 155—184, 2003.

⑥ 当然,虽然按人口和劳动的分配比例不同,但不不管是哪种分配总需要相应的工分数去抵,不足者则为“赤字”。感谢匿名评审的提醒。

⑦ 对最年轻的 8 个妻子进行统计,发现平均结婚年龄为 22.3 岁。结婚年龄由 1976 年妻子年龄减去该年最大孩子年龄所得。

表 2 家庭生命周期划分

阶段	划分依据(第一个孩子年龄)	划分原因
(1)起始期	0—7岁	8岁是标准成人的最低线,8岁以前则要折合计算
(2)成长期	8—15岁	16岁为全劳动力与半劳动力的分界线
(3)成熟期	16—29岁	29岁为平均结婚年龄和最大标准人年龄和(22+7)
(4)老化期	30岁(含)以上	可以转换为另一种家庭形式

(1)起始期之所以将孩子年龄上限标准定为7岁,是因为先按人口后按劳动工分分配是集体化时期粮食分配政策,人口年龄不同对粮食的需求有所差异,因此在按人口分配时有一套比较科学的划分方式,小孩和老人要按年龄折合成标准成人数。小孩的折算方法各地虽略有不同,但总体来说一般以7岁为界,7岁(包括7岁)以前要折合计算,如北街2队的划分方法:0—3岁=0.5标准成人、4—7岁=0.8标准成人,8岁以上即看作标准成人,因此本文将阶段1的上限按最大子女7岁作为划分界限<sup>①</sup>。

(2)成长期家中最大子女超过7岁小于16岁。一般而言在集体化时期青年人参加劳动时间较早,通常在12以后便可以参加,有的甚至更早,但一般都作为辅助劳动力或半劳动力使用,只有到了16岁才开始逐渐成为整劳动力,整劳动力与半劳动力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所挣工分上均有较大差异,因此我们将成长期阶段划分标准定为16岁。

(3)成熟期家中最大子女达到全劳力年龄(16岁),最大上限为29岁。上限定为29岁是因为,子女一般在22岁左右开始结婚生子,其后家庭可粗略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在孙子女一两岁后,年轻的夫妇分家独立门户,新的小家庭开始一轮新的家庭生命周期;而尚没有分家的子女则和父母形成另一种模式,即在其子女小于7岁时家庭劳动和消费没有质的变化(参见起始期),因此以29岁作为上限<sup>②</sup>。家庭最大子女等于或超过30岁<sup>③</sup>则为(4)老化期。

## (二)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收入

北街2队家庭周期与人均工分收入<sup>④</sup>如图1所示。横轴为家庭中第一个孩子的年龄,表示家庭周期所处的阶段,主纵轴为人均工分收入,表示家庭收入,副纵轴为标准人数,表示家庭规模。总体来看,人均工分收入与家庭标准人数随家庭生命周期呈一定规律的波动趋势。首先观察家庭标准人口:阶段1家庭规模较小,随后逐渐上升;阶段2继续成长,缓慢上升;阶段3家庭规模继续扩大并达到最大值;阶段4家庭规模逐渐收缩,最后达到最低值。再观察家庭标准人均工分收入:阶段1开始时收入较高,随着人口增加人均收入逐渐变低;阶段2收入继续变小,并在一定时期达到最低;阶段3继续阶段2后期的反弹上升,并达到最高点;阶段4逐步下降回落。可见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均与家庭生命周期密切相关。

接下来分析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与家庭收入的数量关系,结果如表2。

① 集体化时期的粮食分配成人折合划分标准,是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这一划分原则与20世纪20年代恰亚诺夫根据苏联的情况提出的划分指标相似。因标准人数反映的是个人对食物的需求量,因此以其作为家庭生命周期的标准有一定的可信性。

②  $29 = 22(\text{结婚平均年龄}) + 7(\text{标准成人最大折合年龄})$ 。

③ 家庭最大子女超过或等于30岁,这一规定是理论上的,实际上从北街2队账本资料上看,很多属于这一阶段的家庭中已经没有子女(都已分家),这时我们根据老年夫妇的年龄来推算其子女的年龄而进行划分,比如79号家庭杜瑞家只有两人(户主和妻子),两人年龄都为77岁,由此大概推算其子女为51岁,则划归为老化期。实际上本文另一个简单做法是将年龄超过52岁只有夫妇二人的家庭直接划为老化期。

④ 我们同样也做了家庭周期与人均现金收入,结果发现总体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故此只讨论人均工分收入。此处的人均工分收入已经经过标准化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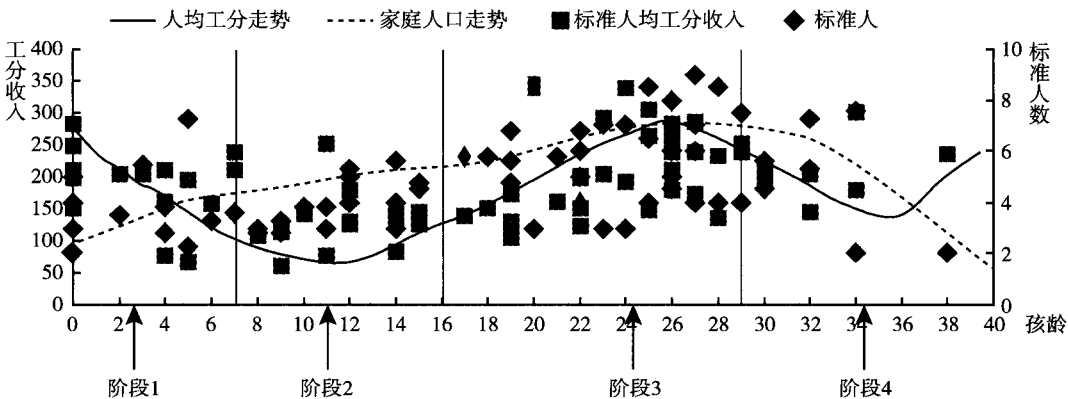


图1 北街2队1976年家庭周期与人均工分收入

注:人口和人均工分数均经过标准人处理。处理标准为,0—3岁=0.5标准人、4—7岁=0.8标准人、8岁以上为1标准人。

表3 1976年北街2队农户的家庭周期与集体收入

时期	起始期	成长期	成熟期	老化期	总计
第一个孩子年龄(岁)	0—7	8—15	16—29	30以上	—
户数(户)	10	23	29	22	84
母亲年龄均值(岁)	27.00	38.58	47.32	62.25	44.87
家庭规模(人)	3.70	4.91	6.17	1.86	4.40
标准人均劳动日(日)	183.18	136.27	213.54	208.68	185.42
标准人均现金(元)	19.42	6.09	25.96	20.24	17.93
劳均工分收入(日)	321.18	340.24	313.19	544.93	379.89
劳动供养比(人口/劳力)	1.85	2.57	1.56	2.56	1.90

注:北街2队共有93户,其中有5个家庭属于下乡青年户,另外有4个家庭情况有些特殊或缺少数数据,因此这9户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所以表中只有84户。表中阶段划分主要以第一个孩子年龄为标准,但根据实际情况也做了一些调整,比如21号家庭位Q合家(按原资料抄录,姓氏可能有误)全家共8口人:一对老夫妇(49岁和52岁)、一对年轻夫妇(33岁和34岁)和四个孩子(13岁、10岁、7岁和5岁),因老夫妇是家长,如果按他们的子女年龄算则为33岁属阶段4(老化家庭),实际上该家庭应该划为阶段2(成长家庭,按孙子辈年龄划分)更为合适。

1. 起始期。这是家庭的开始阶段,此时年轻夫妇刚从父母那里分家出来,组成新家庭,他们一般没有孩子或有一两个、最多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年龄不超过7岁。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夫妇年龄一般在22—30岁之间,此时夫妇年轻力强,都为可以挣满工分的全劳动力,同时需要供养的人数较少。虽然由于妻子的怀孕和生育有可能较少劳动参与时间,但由于此时妻子正处于旺年身体恢复较快,不久即可参加劳动,影响的劳动时间并不太多,且同时生产队对孕产妇有一定的补助。因此这一阶段总体来说,夫妻劳动能力较强,需供养人数较少,属于经济条件较好阶段。

属于这一阶段的农户有10户,其家庭规模较小,户均人口3.70人。这些家庭劳动力数量不多(最少1个,最多3个),但劳动能力较好(父母都很年轻),平均每个劳动力获得321.18个劳动日。因孩子年龄较小并且数量不多,所以每个劳动力需要供养的人数较少,其劳动供养比为1.85。该阶段家庭收入在全队中处于较过得去的位置。其现金收入并不低,达到标准人均19.42元。

其中仅有两户出现亏空。一户是41号家庭梁X日家,其家庭组成为一位单身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3岁),只有1人劳动,全年仅获得157.2个劳动日,所以出现超支,全年亏5.53元。另一户是87号家庭朱F连家,全家三口人,户主(女29岁)、一个4岁的孩子和一个50岁的母亲。只有一人参加劳动全年劳动日222.5个,全年亏空为10.82元。以上两个超支户均为不完整家庭

(没有男性户主),其他家庭都较为正常。如56号家庭王M然家,全家四口人,34岁的户主、30岁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分别为7岁和4岁),这是比较标准的阶段1的农户。全年劳动日767.3个,年底现金收入104.44元,收入处于队中较好的位置。

2. 成长期。随着孩子年龄和数量的增加家庭进入成长期。孩子年龄在增加的同时(但尚未成为全劳动力,小于16岁),孩子数量也在增加,因此家庭需要供养的人数逐渐增多<sup>①</sup>。作为劳动力的夫妇年龄一般已经超过30岁接近40岁,此时劳动能力仍较强。但与起始期相比,劳动者数量没变,但消费人数却增加了。同时妻子还可以继续生育,但身体恢复程度不如起始期快。因此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劳动人口数量不变而消费人口数量在不断增加,其消费人口与劳动人口比达到所有阶段的极大值,结果致使该类家庭成为生产队中最为困难的农户,许多这个阶段的家庭沦为队中的“超支户”。

这类家庭有23户,家庭规模较起始期为大。家庭处于成长阶段,孩子已经长大需要相当于成年人的消费量而劳动能力尚未到达(即使有的孩子劳动能力很强也很难能得到高工分),即劳动人口少而消费人口多,其劳动供养比为最高值2.57,该类家庭的经济状况最为难过。尽管每个劳动力获得了340.24个劳动日,但因人口众多,其标准人均现金收入仅为6.09元,是全队农户中收入最低的。

在成长期农户中,处于标准人均工分收入与标准人均现金收入两端的,最高的为10号家庭梁G兵家为253.1个和35.24元,最低的为88号家庭毛R凤家63.7个和-8.78元。每个劳动力平均工分最高为15号家庭赵Q姐家为470.25个劳动日,最低为53号家庭苗P家255.10个劳动日。

普通家庭具体情况如25号家庭杜M仓家,全家共5口人。男户主39岁、妻子34岁,三个孩子分别为12岁、9岁和7岁。三个孩子均不能参加劳动,只有夫妇2个全劳动力,其劳动供养比为2.5,人均劳动日高达349个(劳动强度较大),但其全年现金收入却是负数达-26.20元,接近成长期家庭中最低水平。

3. 成熟期。当子女逐步进入全劳动行列时,家庭进入成熟期,此时家庭中劳动力数量逐渐增加,劳动工分的增加速度大于消费增加的速度。这时夫妇年龄为39—52岁,尚处劳动能力较强时期。该阶段特点是,家庭中劳动人口增加、劳动能力增强,而消费人口没有大的变化,因此劳动人口所供养的人数减少,是村里最少的阶段,因此在村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同时这一阶段的家庭往往也是村中人口最多的。此阶段也是开始分化的阶段,没有分家的农户将是村里最大的家庭,分家出去的年轻夫妇(有孩子或没有孩子)成为起始期家庭,剩下的老年夫妇(和未结婚的子女)则逐步走向老化期。

这类农户占全队家庭的多数为29户,因家庭中子女逐个结婚并生育子女,因此这类家庭规模最大,达到户均6.17人,人数最多的为9人(共有3户)。人数最多的农户的家庭结构如:29号家庭杜Q家,分别为一对老年夫妇(68岁、56岁),一对年轻夫妇带一个孩子(28岁、26岁、4岁)和两个未婚儿子(25岁、20岁)以及两个未婚女儿(22岁、16岁)。33号家庭杜H城家,分别为一个84岁的老父亲,54岁的男性户主和50岁的妻子,27岁和28岁尚未分家的年轻夫妇,以及其他四个孩子(24岁、21岁、19岁、14岁)。

家庭中因人口众多,劳动力丰富而需供养人数少,其劳动供养比为全队最低,仅1.56,而其人均工分收入达到相当高水平的213.54日,标准人均现金收入也达到较高的25.96元。这个阶段应该是所有阶段中生活最为有利的。标准人均工分收入最高为307.2日,最低为150.0日。这个阶段中没有一户欠生产队钱,均为年底有余户,标准人均现金收入最高为51.54元,最低为2.34元。

<sup>①</sup> 家庭子女在12岁左右开始帮助家里作为辅助劳力或半劳力参加劳动赚取工分(一般3—6分不等),尽管这一现象在集体化时期较为普遍,并被政府所提倡,但事实证明这一阶段子女所挣工分数远抵不上其消费量,从而加重了夫妇的负担。

如 60 号家庭杜 M 贵家属于这类,其家庭共有 8 人,夫妇二人均为年轻力壮的 49 岁,有六个孩子,分别为 26 岁、24 岁、20 岁、17 岁、14 岁和 12 岁。在 8 口人当中有 6 人(至少是 5 人)属于全劳动力,其余 2 人(最多 3 人)是半劳动力,即全家人都有能力参加劳动,因此其全年工分收入高达 1 927.6 日,几乎是全队最高的,人均工分达 241.0 日,标准人均现金收入为 31.31 元,远高于平均水平。

4. 老化期。此时子女逐渐从大家庭中分化出去单过,剩下老年夫妇和一两个或两三个尚未结婚的子女。夫妇年龄一般超过 50 岁,其劳动能力逐渐下降,逐渐退出全劳力行列,但仍能参加劳动(工分数从一天挣 10 分减少到 9 分、8 分、7 分及以下等)。因其具有多年的劳动经验,所以工分数减少的速度较慢。尚未结婚的子女也是家里的劳力。

因此这一阶段特点是劳动收入尚不算太少。但随着老年夫妇劳动能力下降,子女出嫁或分家而减少劳动力,该类家庭的收入逐步趋于减少,家庭规模也由第三阶段的最大突降到家庭生命周期的最小。虽然子女分家独立生活但其对父母家庭还会有一定的照顾,比如直接给工分或在做计件制农活时与其一起劳动,期间有所照料,总之老化家庭的收入并不低。

成熟期家庭持续一段时间以后(一般为 1—5 年),当家庭中第二个儿子结婚生子,第一个儿子的子女长大到 5 岁左右便开始分家,年轻夫妇进入起始期而剩余的老年夫妇和几个未结婚的子女慢慢进入老化期,这时家庭规模迅速萎缩。表 3 显示,家庭平均人口仅 1.86 人。老年夫妇随着年龄增加开始退出劳动力队伍,工分逐渐减少,一段时间内可以做为半劳力维持劳动最终则完全退出。因此其劳动供养比又开始增加,达到与成长期相当的水平(2.56)。但因其自身的劳动和子女的照顾,其收入并没有滑向最难过的境地,而是保持着一定的优势,其标准人均工分收入为 208.68,现金收入高达 20.24 元。

如 36 号家庭杜 N 年家,共 3 口人,老年夫妇(64 和 57 岁)以及一个尚未出嫁的 24 岁女儿,男性户主虽然已经 64 岁,但仍然可以作为全劳动力使用,妻子可以作为半劳动力,加上女儿的劳动则有两个半劳动力,另外儿子有一定的照顾,因此其收入并不低,达人均 339.4 元。但这阶段的一些农户生活较为艰难,如 76 号家庭杜 W 选家,仅有老夫妇两人(64 岁和 68 岁),都已不是劳动力。全年人均仅 115.3 个劳动日,此时现金收入也几乎滑到最低的 8.56 元。

总之,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村,农户家庭收入与劳动人口和消费人口分化所造成的家庭所处生命周期的阶段有密切相关性。在起始期消费人口与劳动人口比值较小,其经济条件较好;成长期消费人口与劳动人口比在所有阶段中最大,其经济条件最为不利;成熟期消费人口与劳动人口比达到最小,其经济条件最为有利;老化期中消费人口与劳动人口比变大,经济条件有所下降。家庭人口、劳动供养比例,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第一个孩子年龄)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发生变化的是劳动努力程度和家庭收入。

## 四、人口生命周期与农户收入

### (一)人口生命周期阶段划分

根据人口年龄和性别,并考虑集体化时期的人口特点、特殊的劳动组织与分配制度、社会文化(如婚姻、教育)等,将男性人口分为五个阶段、女性人口分为六个阶段,如表 3(划分原因与上部分基本相同)。这部分与上一部分的区别是,上部分是按家庭中第一个子女的年龄将家庭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即第一个子女的年龄决定了家庭中所有人的阶段,而这部分直接将家庭中所有人按年龄和性别来划分阶段<sup>①</sup>。

<sup>①</sup> 当然这里面所用的因变量依然是家庭收入。



表 4 人口生命周期划分及各阶段特点

阶段	划分原因	特点
(1)0—7岁	8岁为标准口粮划分点	均为纯消费人口,对收入的影响一般为负
(2)8—15岁男	16岁为进入整劳动力起始年龄	男性慢慢从纯消费人口转到半劳动力再过渡到全劳动力(少数变为全劳动力),但由于进入劳动力行列的速度有限,加之部分孩子接受学校教育,或到工厂等地学习手艺,因此该阶段多数人还以消费为主,对收入一般也是负向影响
(3)8—15岁女	16岁为进入整劳动力起始年龄	同8—15岁男相近,处在从纯消费向半劳动力过渡阶段,但与前者不同的是,因“重男轻女”思想的存在,那些上学、学徒、进工厂等学习的机会很少能降临到女孩头上,因而女孩有一定的时间参加劳动,由于消费和劳动共存,但以消费为主,因此其对收入的影响偏向负向
(4)16—22岁男	22岁为平均结婚年龄	这阶段的男孩基本已经迈入整劳动力行列,但由于第(2)阶段的分析原因尚在,其对收入的影响应该不是很大
(5)16—22岁女	22岁为平均结婚年龄	这个阶段的女性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出嫁。“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儿一出嫁就是别人家的人了,就不会再为自己家干活了”,因此娘家会充分利用好出嫁前的这段时间。这时也是她们劳动最好的时段,尚无哺育幼儿之压力,因此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应该是正向的
(6)23—60岁男	全劳动力时期	这个阶段的男性是家庭中最主要的劳动力,一般无特殊情况均为整劳动力(挣满分的10个工分),男性到60岁尚有劳动能力(其底分刚开始下滑),因此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应该是最为明显的正向
(7)23—30岁女	女30岁后逐渐减少生育	这个阶段的女性正处在生育的高峰期(平均初婚年龄22岁左右),生育会对劳动的出勤时间有较大影响,但由于处在年轻阶段身体恢复较快,在生育间隔期间是她们出工的好时机,所以对收入也为正向影响
(8)31—50岁女	全劳动力时期	处在生育后身体恢复较慢和需要照看孙子女时期,同时伴随劳动能力下降
(9)61岁以上男	男60岁后退出劳动力行列	劳动力开始下滑阶段,对收入的贡献呈下降趋势
(10)51岁以上女	女50岁后退出劳动力行列	劳动力开始下滑阶段,对收入的贡献呈下降趋势

(二)模型和数据描述

依据上面对人口生命周期所做的划分,我们将直接按各阶段的人口数量对家庭收入做回归计算<sup>①</sup>,从而反映出每个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个人对家庭经济的贡献。以此来解释人口生命周期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同时在结果的解释上更加入了制度、文化等多种因素。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建立一个普通的线性回归模型:

$$y = \alpha + B_i X_i + \varepsilon \tag{1}$$

(1)式中因变量y为家庭收入,B<sub>i</sub>为自变量X<sub>i</sub>的回归系数,X<sub>i</sub>为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用各个生命周期的人数表示,比如某家庭有2个人属于第一生命周期则该变量值为2,如果有1个人属于另一生命周期则变量值为1,没有人属于这个周期则记为0,依此类推。ε为随机误差项。各生命周期阶段的人口分布如表5所示,样本量为88户,377人<sup>②</sup>。

① 因数据的限制我们并没有控制诸如户主年龄、学历等常用的控制变量,但经验分析发现这样做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  
② 虽然样本量较小,但受资料所限,我们认为这样的尝试仍具有一定意义。

表 5 各生命周期人数分布

年龄阶段	人数	百分比(%)
(1)0—7 岁	53	14.06
(2)8—15 岁男	27	7.16
(3)8—15 岁女	42	11.14
(4)16—22 岁男	20	5.31
(5)16—22 岁女	26	6.90
(6)23—60 岁男	85	22.55
(7)23—30 岁女	33	8.75
(8)31—50 岁女	33	8.75
(9)61 岁以上男	20	5.31
(10)51 岁以上女	38	10.08
合 计	377	100.00

注：阶段划分中的男表示男性，女表示女性，没有标注的为男、女均包括。

人均工分收入最能反映集体化时期家庭收入状况，因此我们直接利用人均工分收入作为因变量。集体化时期的主要收入实际上只有工分收入一种，将工分收入扣除支出部分的剩余可折合为现金，这部分即为现金收入，换句话说，现金收入只是工分收入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专门一种收入，但现金收入的多少与人口生命周期之间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讲人口处在劳动力旺年之时则现金收入较高，处在以消费为主的生命周期阶段时则现金收入较低，现金收入与工分收入应该差不多同时波动。各种收入的统计量如表 6。

表 6 各种收入统计量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均工分收入	185.41	75.70	0.00	343.40
人均现金收入	19.77	18.99	-38.33	59.97
工分总收入	768.74	462.18	0.00	1 927.60
现金总收入	78.62	73.74	-76.65	262.80

注：工分收入单位为：分数，现金收入单位为：元。现金收入已扣除支出部分。有效样本数 88 个。

人均收入均值为 185.4 个工分，折合计算人均可获得现金 19.8 元，每个家庭的总工分收入均值为 768.74 分，家庭总现金收入均值为 78.62 元，家庭现金收入最低的为负 76.65 元，即一年的收入核算完之后尚欠生产队 70 多元，最高收入为 262.8 元。

(三) 回归结果

人口生命周期对收入的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人口生命周期对收入的回归结果

	(1) 人均工分收入	(2) 人均现金收入	(3) 工分总收入	(4) 现金总收入
(1)0—7 岁	-26.485 ** (-2.513)	-8.069 *** (-3.089)	44.372 (1.473)	-15.644 ** (-2.045)
(2)8—15 岁男	-31.893 ** (-2.362)	-8.949 *** (-2.674)	65.301 * (1.692)	-16.076 (-1.639)
(3)8—15 岁女	-14.578 (-1.061)	-4.346 (-1.276)	86.325 ** (2.198)	-5.732 (-0.575)
(4)16—22 岁男	-12.651 (-0.791)	-3.935 (-0.993)	140.035 *** (3.065)	3.503 (0.302)

续表 7

	(1)人均工分收入	(2)人均现金收入	(3)工分总收入	(4)现金总收入
(5)16-22岁女	7.684 (0.590)	1.542 (0.477)	224.286*** (6.020)	27.420*** (2.898)
(6)23-60岁男	28.940*** (3.202)	5.772** (2.577)	275.444*** (10.662)	38.988*** (5.943)
(7)23-30岁女	17.984 (1.119)	4.784 (1.201)	267.143*** (5.814)	43.656*** (3.740)
(8)31-50岁女	-15.367 (-0.651)	-3.933 (-0.672)	159.0** (2.355)	10.303 (0.601)
(9)61岁以上男	3.848 (0.201)	0.291 (0.062)	113.748** (2.082)	-3.862 (-0.278)
(10)51岁以上女	-11.491 (-0.653)	-2.536 (-0.581)	174.129*** (3.462)	18.455 (1.444)
常数	193.867*** (10.143)	25.024*** (5.279)	55.789 (1.021)	21.824 (1.572)
观察值	88	88	88	88
R-squared	0.327	0.343	0.852	0.626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 。

对于人均工分收入(回归结果1)和人均现金收入(回归结果2),估计结果显示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两者除了在系数上有差别外,在显著性上并无明显不同,具体如下:

(1)0—7岁阶段。处在生命周期这个阶段的人口属纯消费人口,且母亲需要照顾尚未离开哺乳期的婴儿,因此对人均工分收入和人均现金收入均为显著的负向作用,回归结果(1)显示,其人口每增加一个则人均工分收入减少26.48分,相应的人均现金收入减少8.07元。

(2)8—15岁男性阶段。和预期的一样,该阶段人口正处在从纯消费向半劳动力转化,本来劳动时间有所增加,但伴随而来的是上学、学工等学习投入<sup>①</sup>,既不能参加劳动又会增加支出,结果该阶段对人均工分收入与人均现金收入都是负向作用,且显著性非常强。与0—7岁比较,该阶段的负向效应更强,每增加一个人口则人均工分将减少31.89分。

(3)8—15岁女阶段。和同年龄段的男性一样,均为从纯消费向半劳力过渡,因此对工分收入和现金收入均有负向影响,但与男性不同的是,该阶段的女性既很少上学又没有太多学徒的机会,进厂工作一般更是男性的事,所以她们有一定的时间参加劳动。因此两个原因叠加在一起,造成了女性对人均工分和人均现金收入为负向影响,但统计上并不显著。

(4)16—22岁男阶段。这时男性已经基本从半劳动力转向整劳动力,但(2)8—15岁男阶段的现状还在这个阶段延续,即他们当中还有一部分人在上学或当学徒,或有的已经在工厂工作了,但其收入没有在这里统计,因此我们看到的结果依旧是负向影响,但统计上并无显著性。

(5)16—22岁女阶段。该阶段是(3)8—15岁女阶段的延续,与上个阶段明显的差别是,此时对收入的影响已经完全由负向变为正向,这可能跟家庭对她们的劳动利用程度有关,但显著性依然不强,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肯定这种影响关系。

(6)23—60岁男阶段。这个阶段对家庭来说是最为重要的阶段,此阶段的男性基本都为整劳动力,可以获得最高底分的工分,绝对是家庭的主要挣工分者。回归结果显示,其对人均工分收入和对人均现金收入均具有强烈的正向相关性。每增加一个劳动力可以增加人均工分28.94分,可以增加

<sup>①</sup> 实地调研得知,当时该地区的青年人选择上学、进城学徒,或准备替代父亲进厂工作的事件时有发生。

人均现金 5.77 元。

(7)23—30 岁女阶段。该阶段的女性也为整劳动力,可以评为最高的底分,对家庭经济有正向的影响,但这个阶段的女性面临的问题是生育子女,是她们的生育高峰期,所幸由于身体素质较好,生育之后身体恢复较快,尽管生育和抚育子女的过程中影响了劳动时间,但由于自身的优势,回归结果显示出了正向关系,但两者共同作用,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8)31—50 岁女阶段。靠近 30 岁,部分妇女还有生育能力,但此时身体恢复不如前一阶段,靠近 50 岁时一则个人本身劳动能力逐渐下降,从整劳动力逐渐下降到半劳动力,二则该家庭的第三代人刚刚出生不久,照顾孙子辈的责任往往落在她们身上。因此该阶段的女性要么自身生育而身体恢复慢,要么需要照顾子孙,并且都伴随着身体劳动能力的下降,此时她们对收入的影响从上一个阶段的正向变为负向了,但同样统计上不显著。

(9)61 岁以上男阶段。他们多数已经不是整劳动力,慢慢的退出劳动力行列,但迫于工分的压力他们还需要出工,因此对家庭经济来说还有积极意义,但并不显著。

(10)51 岁以上女阶段。此时的女性不像男性还为了工分去参加劳动,她们主要以照顾家庭为主,很少或不再参加集体劳动,因此在家庭收入上显出负向关系,但同样没有明显作用。

对于总工分收入(回归结果 3)。所有阶段的估计结果都是正的,说明只要有人口增加就必然要促进工分数量的增加,不然不足以抵消基本生活所需的粮食。这里并不是说所有人口对工分收入都是正向的影响,而是说由于家庭人口的增加必须要多挣工分,因劳动时间或劳动强度增加而导致工分数量上升。

继续按人口生命周期考察,发现只有 0—7 岁的儿童对工分总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其余都是显著的,且越是劳动能力强的阶段显著性越强。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理论,即随着家庭人口数量的增加其劳动投入也增加。从数量上看,影响最强的是(6)23—60 岁男性,该阶段也是所有生命周期中劳动能力最强的时期,一个劳动力可以带来 275.4 个工分,相当于一年的四分之三以上的劳动时间(一天按 10 个工分算,这里的计算折合成一天 1 个工分,则要大概 275 天)。其次是(7)23—30 岁女性,一个劳动力可以带来 267 个工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16—22 岁的女性所得工分要远高于同时期的男性,这再次证明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问题(社会文化)。此时一个女性可以贡献 224 个工分,而一个男性才能贡献 140 个工分,女性高于男性 84 分,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当于一个正常男性劳动力两个多月的劳动量。

这里充分反映了工分制的制度安排下,家庭对不同性别劳动力的使用差异。“女孩早晚要嫁出去的,不让她们干就没机会了,养这么大给别人了,当然要让她们多干一些。当然另外说来,这样对她们也是有好处的,她们干的多,挣的工分多,说明她们能干,她们有劳动能力,她们勤快,这样她们也能找个好的婆家,到婆家也不受欺负。再者,她们干的多,等出嫁的时候家里也能陪嫁些东西不是!”(生产队会计杜某访谈记录,2009 年)。

就性别而言,对家庭经济来说,均从生命周期的起点慢慢上升,在 20 岁以上逐渐达到顶点,然后在 50 岁以前出现下降,随着生命周期周而复始的变化。

对于现金总收入(回归结果 4)。总体上也与前三个回归方程相似。(1)0—7 岁,纯消费阶段,显著的负相关。(5)(6)(7)16—30 岁女和 23—60 岁男,最有力的劳动力阶段,显著的正相关。即使是考虑到家庭的历史性因素之后,依旧显示出与人口生命周期较强的相关性,完全符合生命周期的规律。

综上,四个回归结果均在一定程度上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人口生命周期对家庭经济的影响,处于生命周期的消费阶段时对家庭经济有负向影响,处于生命周期的劳动旺盛阶段时对家庭经济有正向影响。同时家庭生命周期又与当时的制度(工分制)、工厂用工制度(顶替、学徒等),和中国的传统

文化(女孩出嫁)等交相呼应,共同影响了家庭经济。我们的结果再次提醒生命周期对于理解中国农村的重要性。

## 五、结 论

上面的分析为我们展现了中国集体化时期农户分化的一个原因,分析发现,集体化时期农户收入与家庭生命周期和人口生命周期有密切关系,家庭收入水平一定程度由人口分化所决定。具体地利用1976年北街2队的一手账本资料,按家庭中第一个子女年龄和数量将88个农户分为四个家庭生命周期,按人口年龄和性别将男性人口分为五个生命周期段、将女性人口分为六个生命周期段。

研究表明,在家庭生命周期中阶段1因家庭中劳动人口较多,消费人口较少其收入水平较好;阶段2因家庭中劳动人口较少而消费人口数量增加较快,同时家庭中妻子生育子女后身体恢复较慢(该阶段身体素质下降),致使家庭中劳动人口需供养的比例较高,结果家庭人均收入最少,是集体化时期生活最困难的家庭;阶段3因子女逐渐成为全劳动力而使劳动人数大为增加,结果劳动人口供养比例快速降低,因此该阶段的农户生活最为轻松富裕,是集体化时期生活最好的农户;阶段4的农户子女逐渐结婚生子而分家单过,则老年夫妇和尚未结婚的孩子一起,家庭劳动能力逐渐下降工分收入渐渐减少,但因有一定的劳动基础加之子女的照顾,其收入水平维持在较高水平。

人口生命周期的计量结果发现处于生命周期的消费阶段时对家庭经济有负向影响,处于生命周期的劳动旺盛时期对家庭经济有正向影响。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家庭生命周期又与当时的工分制度、教育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女孩出嫁)等交相呼应,共同影响了家庭经济。

这一分析将为我们理解集体化时期的众多社会事件打下坚实基础。比如工分制下的农户劳动配置,至此我们将更加容易理解为什么出嫁前的女孩工分挣的多,为什么有的家庭投入劳动多而有的家庭则相反等。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也许可以对人民公社解散做出一点解释,公社的失效通常被解释为监督不力和激励不足,进一步地分析则认为监督不力的原因是农业生产太过复杂,激励不足的原因是农业分配太过平均主义,这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少有实证分析。而我们的分析也许可以发现,生命周期在分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可能是分配平均主义的更进一步解释。此外,我们的文章再次说明集体化时期的账本资料所蕴含的丰富信息,这些资料也许可以为我们解释更多更复杂的问题提供素材。

当然本研究的不足是样本量相对较少,只有一个生产队样本,这对反映全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许今后随着资料的丰富这些不足可以得到弥补。